



连线

湖南

私人定制

：

走向日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王

芳

撒菜种、锄杂草、摘菜蔬……渐渐细雨中，湖南泸溪县五里洲蔬菜基地菜畦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正在侍弄蔬菜的五里洲村村长杨顺秀告诉记者：“以前一亩地最多生产2800多公斤豆角。自从搞测土配方施肥后，亩产达到了3200多公斤，能增加收入800多元。”杨顺秀家里有菜地5亩左右，家庭收入以种菜为主。“去年，县里土肥站提出在我家的菜地里进行测土配方施肥，一开始，我将信将疑，同意在种白菜、豆角、茄子的三块地里使用配方肥。没想到用了配方肥的三块菜地的产量比以往高出两、三成，肥料支出还节约了近一半。今年我打算将家里的菜地都用上配方肥，一年下来就可以多赚四五千元。”麻利地将手中白菜苔用稻草捆好，杨顺秀指着指头跟记者算了笔账。

泸溪县农业局土肥站长长石泽平介绍，近年来，为了使科学施肥推广到田间地头，泸溪县开始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根据全县150个自然村土壤化验分析结果，因地制宜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我们积极打造‘私人定制’田间施肥模式，免费为有需求的种植大户开展测土配方个性化服务，为其分析详细土壤成分，提出土壤改良建议及施肥建议。”石泽平说，目前泸溪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已初见成效，建立了“测一配一产一供”运行机制，每年对水稻田、槿柑田、蔬菜地等各种土壤类型进行采样分析；在全县150个村建立了测土配方信息公示栏，适时更新配方施肥方案，指导农户合理施肥，40多家配方肥经销网点遍布15个乡镇。

“配方肥，农家宝。”提起测土配方施肥，一大早起来育秧的农户杨光美忍不住在一旁搭话：“我家种的茄子一亩肥料成本只有百十来块钱，去年茄子行情好，每亩差不多可以多赚千把块钱。”杨光美小心翼翼将菜苗边的薄膜用土块压好。

据了解，泸溪县每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70多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15.6万亩，槿柑种植面积30多万亩，蔬菜14.6万亩。目前该县每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约40万亩，施用配方肥1500吨（折纯），极大地提高了肥料利用率，也改善了滥用化肥引起的农业污染情况。

让农产品生意不难做——

农产品交易有了先行赔付计划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传统农产品交易都是钱货两清，如果交易后农产品有损坏只能自己承担。现在有了第三方机构赔付机制，我们安心多了。”3月25日，湖北武汉四季美果蔬批发市场的采购商徐良兵拿着3800元的赔偿金，感慨不已。两周前，他通过农产品交易平台“一亩田”，找到湖南省江永县商户达成一笔莴苣交易。不料，由于沟通问题，送货到店时间晚了5个小时，致使部分莴苣烂掉无法卖出。“一亩田”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告诉他可以获得第三方赔付金，挽回部分损失。

赔付金的依据，源于“一亩田”近期推出的国内首个农产品交易第三方“先行赔付保障计划”。依照该计划，交易双方在“一亩田”网站或app达成的交易，如在交易过程中遭遇欺诈、供应商发布虚假信息导致买家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买家均可向“一亩田”申请先行赔付；供应商交付期限与事先约定不符并造成买方损失的，也可以申请先行赔付。

据“一亩田”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公司推出第三方赔付计划的初衷，就是帮助农产品交易双方降低因为信息不透明、互不信任而带来的交易风险。从第三方赔付开始，“一亩田”近期还将陆续推出更多促进交易的保障措施，建立买卖双方诚信大数据平台。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近年来，国内农产品交易呈现出交易量放大、滞销明显增多、供需信息失衡等问题，以“一亩田”为代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出现，为产销双方提供了一个高效快速、守信安全的交易平台，长远来看，互联网模式将对改善国内农产品的交易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日前，山东博兴县农机销售服务中心，当地农民正在选购农机。进入春耕备耕时节，该县积极落实国家对农机的补贴政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本版编辑 李 亮

经过各方持续努力，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在快速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开始大量涌现。虽然整体上数量还不占优，但他们在农业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渐突出，尤其是以他们为主体成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已经构成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表明现代农业正在快速推进。

“谁来种地”正在破题

——我国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题调研(上)

本报记者 瞿长福

春争日，夏争时，开春第一场“重头戏”春耕正自南向北火热推进。与往年相同的是，抢抓农时始终是种粮人脚下不变的节奏；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野上的春耕人正越来越多地从老农民转变为更自信、更年轻的新农民。

新农民的加快成长，改写着我国传统农耕格局，也标志着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令人担忧的“谁来种地”难题正在加紧破解。

新农民既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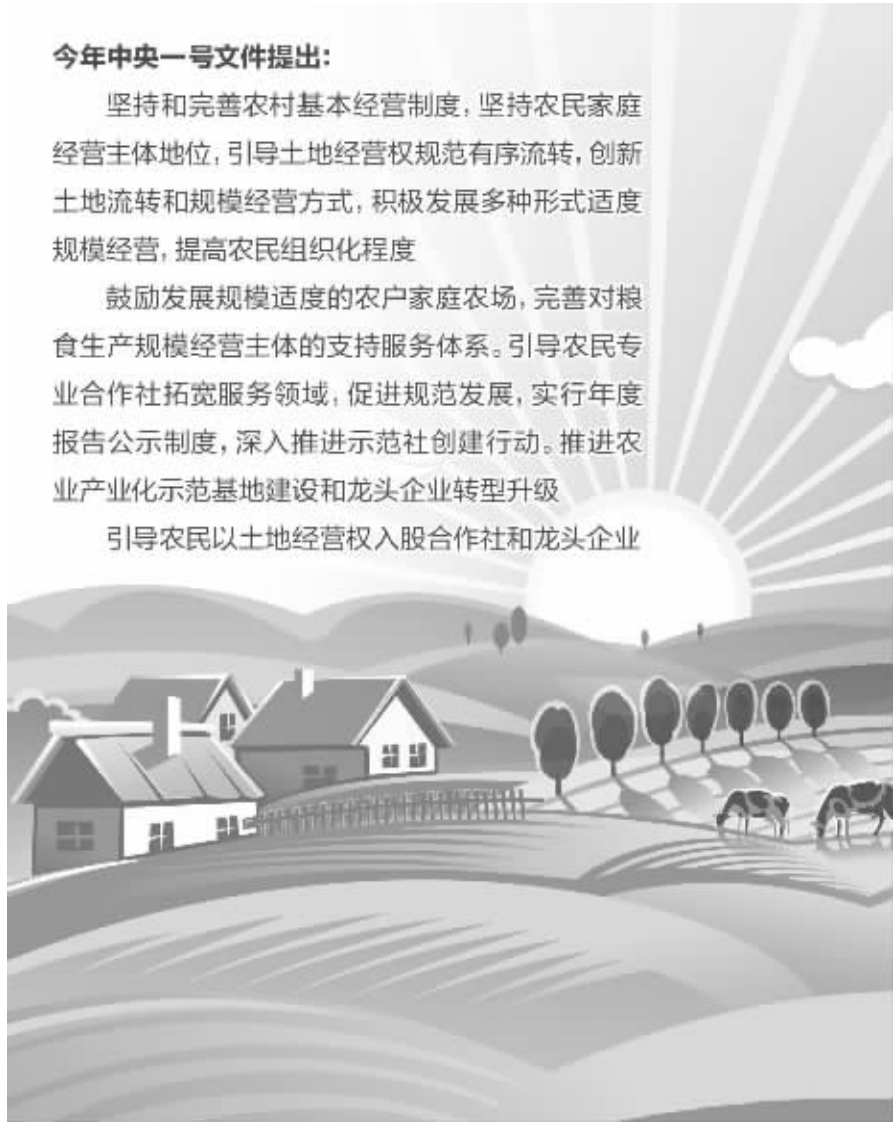
随着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

新农民都是哪些人？在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53岁的陈根花是个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但他说自己也是新农民。陈根花是个老农机手，去年他租了村民的180亩农田耕种，今年又租了120亩，成为村里第一种植大户。“怎么看我都是新农民了。”他说。

像陈根花这种“机手+农民”的新农民，属于本土能人。在乡村，本土能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或者在乡镇、村委会任过职，能力强、有眼光、会挣钱。随着农业扶持政策不断加强和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并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与陈根花毗邻的种植大户曹修叨曾是有名的农机手，现在他的家庭农场有800多亩地。安徽天长市二墩村的华福昌当过村委会主任，2009年成立桑泊湖稻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000多亩。

新农民的另一主体是回乡能人。回乡能人大多务过工、经过商，甚至办过厂，他们在政策影响和效益驱动下返乡，搞规模化种养或者农产品加工。由于懂市场、会经营、有胆量，回乡能人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手段。江西省安义县西路村种植大户凌继河，2009年回村看到很多土地租不出去，决定不再外出，专心做农民。现在他的种植合作社总共流转耕地1.8万亩。山东肥城市高新区东华农场董事长刘东华也一样，2007年放弃做生意回家种地，如今他的农场规模达到1500多亩，忙得不亦乐乎。

与能人们大多是老面孔相比，新农民的另一个群体则是真正的新面孔。他们年轻、阅历浅，但有知识、有勇气，是正在成长的新型职业农民。江苏省洪泽县兆丰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志慧2007年大学毕业后当村官，后来留在了农村，现在她的合作社成员有120多人，服务农田近2万亩。四川农大研究生张超今年30岁，4年前在仁寿县珠嘉乡承包200亩地搞栽培试验，他的试验田产量比周边高，很受农民喜欢。湖北宜都市松木坪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凡贵直接让



两个儿子做接班人，一个管种地，一个搞管理，全家都是新农民。

“老农民”正不断退出，新老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依靠适度规模，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

新农民快速壮大，意味着老农民逐渐退出。不过，老农民的退出情况各不相同。江西省南昌县朱坊村村民朱杏仁今年52岁，家里有5亩承包地。过去他外出打工，爱人在家种地。2012年，他主动把地租出去，夫妻都打工。朱杏仁是当前比较典型的老农民。这类老农民年纪还不很大，一直是职业打工族，进城安家的可能性很小，可回村种地的意愿和能力也没有，因此主动把地租出去，一来有份收入，二来为晚年留条后路。

除了职业打工族，兼业农民大多也主动将承包地流转出去。他们平时就近打打工，农忙时回家忙几天。但随着时间推移，选择流转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安徽省宿州市灰古镇付湖村的季昌峰，家里有10亩地，平时由爱人和老人种，忙时他帮忙。

2012年他把地租给了当地合作社，每亩租金是900斤小麦。在他们村，村民的农田差不多都租出去了。

另一些主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的举家进城，有的年老随子女生活，有的条件改善已不需种地，还有的不愿种地。不过，整体上留守耕地的农民依然是多数。由于农机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社会服务的扩展，农民们种地不再需要勤爬苦做，变得更加轻松。在农业大省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当地干部说，流转土地面积能占到承包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多，其他省区基本如此，“自耕农”还是大头。

“自耕农”情况千差万别。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农业区，种地收入较高，农民愿意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山东金乡种植大蒜效益好，农户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种地。湖北宜都红花套镇种植柑橘效益不错，尽管橘农大多50岁以上，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即便在山东、安徽、湖北等粮食产区，自种农户也不在少数。山东肥城市湖屯镇大户贾维涛告诉记者，想租地的大户很多，但愿意自种的村民更多。此外，有的农户缺少技术，除了打零工，就靠种地增加收入；有的农户靠承包地供给全家粮食蔬菜；有的农户把种地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株潭地区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今年年初，相关专家对此作了调研评估，认为应急修复治理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基本可行。”湖南省农委主任刘宗林说，尽管专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研究，但稳定的低镉水稻品种、高效实用低成本修复治理技术和产品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迫切要加强镉低积累水稻品种的选育和修复治理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攻关。

目前，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主要停留在单项技术上，大部分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缺乏技术的集成配套，经济性不高，操作性不强、适用范围受限，实际修复效率率低，尤其是在重金属污染修复方面，尚未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可复制易推广、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成熟综合技术措施。

“这就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说，在农业部、财政部等部委的支持下，由中国农科

这种新农民与老农民并存的状况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依靠适度规模和新技术，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四川省广汉市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兴华说，多数耕地会逐渐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但新老农民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接班人”能否大量出现，取决于种地效益等因素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

在安徽怀远县徐圩乡，50岁的尚跃是全县最大的农场主，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了1万多亩土地，村民都跟着他种地。尚跃的大儿子正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大专毕业后就跟着他种地，如今对电脑、农机样样在行。“再过几年可以完全交班了。”尚跃说。

在农村，像尚跃这样的父子搭档已很普遍。多数专业大户都选择了让儿子“子承父业”，一些大户甚至专门让孩子先去企业学习现代管理。安徽天长市的华福昌，儿子一直在工厂上班，现在，老华准备让他回来做农场主了。在新型职业农民中，以能人为主的老面孔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着今天“谁来种地”的难题，而“农二代”的回归，将继续化解甚至彻底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一些普通农户说，“农二代”跳出“农门”，种地赚不到钱是最主要原因。但一个规模种植户，即使以200亩的规模计算，一年收入也不低于10万元。“这样的‘农门’，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湖南浏阳市永和村烤烟合作社理事长刘福瑞说得更直接，“农业不存在有没有人干的问题，只有挣钱不挣钱的问题，效益好，硕士、博士都会来。”

种地效益不仅吸引了“农二代”，也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湖北宜都市共发合作社理事长尤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当公务员，但他喜欢务农，老理事长见他有能力，提前把位置让给了他。一位网络研究专家说，现在以“三农+互联网”进入农村的“新农人”至少超过百万。

除了经济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江西安义县曹村党支部书记熊默祥说，现在种地就怕耕地不平、水路不通，只要基础条件好了，机械化、信息化的手段能用上，种地轻松了，就有人来种地。曹村前几年引进了一个种植大户，但后来大户发现耕地只是表面平整，下面高低不一，机器使不上劲，不租了。湖南浏阳市水山村村民文正元租过地，但苦于耕地不平，退回去了。“没有农业基础条件的根本改善，就没有大户，更别说自己的孩子接班。”他很感慨。

最强专家团队“会诊”重金属污染——

治理稻米镉污染呼唤携手施策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常 理

备受关注的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治理取得新的进展。日前，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创新行动启动会在湖南召开，由中国农科院牵头组织、国内多家权威科研机构160多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将为重金属污染“把脉会诊”。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刘仲齐长期关注重金属污染课题。他告诉记者，稻米中的重金属镉主要是在种植过程中从土壤、灌溉水和肥料转移而来，不同水稻品种对镉的吸收效率不同，土壤酸化程度也影响到水稻对镉的吸收。通过实施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工程，从产前品种选择、产中水肥管理和土壤重金属钝化、产后秸秆回收和稻米加工等方面建立工程手段和措施，截断重金属镉被稻米吸收和富集的主要途径，为稻米安全生产创造条件，从而保障稻米质量安全。

农产品重金属污染被认为是个国际难题，其防治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根据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与“七五”时期相比，土壤中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至40%。专家介绍，我国重金属污染特别是南方地区稻米镉污染是长期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众多污染叠加形成的，污染范围广、面积大。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镉污染不易发现，隐蔽性强，滞留时间长，具有累积性，治理难度大。

有关部门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力度持续加大。农业部、财政部于去年3月批准启动湖南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试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范围。最近国务院专门批复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2014—2018年）》和《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都把重金属污染防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任务。